

于右任

勤仁碑

前川中学校刊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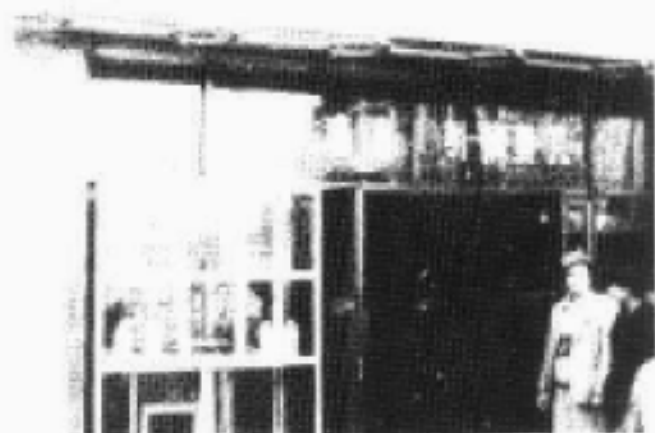
①于右任先生为黄陂县前川中学所题的校刊

②赵师梅教授在辛亥首义后所拍的图片。

③汉星篮球队全体成员



汉口 东来顺饭店



1	2
3	5

③经理杨世龙在办公室布置工作

④厨师黄朝凤精心操作

⑤王瑾与沈林莉两位服务员在餐厅布置餐供

①服务员王萍欢迎顾客光临

②餐厅服务主任方新强正在迎送来宾。



一九八九年第一辑 (总第35辑)

文 化 丛 谈	名 人 軼 事	辛 亥 史 话	人 物
汉口民营新闻通讯社内幕 程一新 卫衍翔 亿名噪三镇的汉星篮球队片断 屠海风 著名楚剧演员李百川 舞台生涯六十年	于右任先生在黄陂二三事 萧星 蒋介石身兼校长琐事 陈诚谈男女平权 蔡文治汤恩伯拔枪相向亲历记 萧耀南与流产的「武汉建国政府」 南皮张氏遗事见闻录	辛亥革命在汉口 (英) 苏古敦 辛亥革命党人中的智囊刘复基 梁华平 悼念辛亥老人赵师梅教授 祝世惠	忠诚教育事业的王星拱 李书城追随孙中山 教育家刘湛恩博士 爱国人士杨经曲 我们所了解的刘翰如 汪浩
商若冰 (86) 居 形 (92) 张伯坝 (96) 万盏灯 (103)	张达骥 (78) 蔡天相 (73) 徐世江 (71) 吴克屏 (69) 黄懋胥 (64) 张 雷 (61)	叶素珍 (44) 祝世惠 (56)	徐正榜 (1) 李新福 (14) 匡 侯 (20) 何正益 (25) 郑忠银 (32)



武汉文史资料

(季刊)

作者著者 作读编	黑网录	江城业 江百	社会百态	沧桑篇	抗战纪事
对吴俊「我所经办的检察汉奸、战犯案」内 「何成济袒护方本仁」的订正 余地青 占利民 (186)	大汉奸叶蓬伏法前后 叶蓬在远东饭店粉墨登场丑闻 李肇君 (183) 王士毅 (179)	武汉饮料二厂 汉口东来顺饭店 黄陂豆腐 胡进 (162) 吉士 (188) 颜学甫 (165)	武汉地区的「上大人」纸牌 旧社会的婚嫁礼俗 徐明庭 朱建颂 (168) 王郁之 (175)	湖北省最早的大冶铁路 汉口和利汽水厂 高国恕与木炭汽车的诞生 武汉银行业发展概谈 我和武昌第一纱厂 唐庸章 (118) 程子菊 (123) 雷世仁 (136) 刘峻安 (145) 少卿 (151) 吴铸九 (148)	营救盟军驾驶员脱险记 「八百壮士」幸存者田际翎的自述 李 远记录整理 (111) 彭光楠 (116)

忠诚教育事业的王星拱

徐 正 榜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刚刚响过的第七天，一位曾拒收蒋介石厚金、拒赴台湾的老同盟会员、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科学家，因积劳成疾，贫病交加，在上海永川医院里，与世长辞了，终年才61岁。他，就是武汉大学创始人之一、武汉大学历史上担任校长职务最久（12年）的校长——王星拱。他一生追求民主、科学，献身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积极主张学术自由、无为而治，努力效法蔡元培的办学精神。当他病逝的消息传出后，在上海工作的300多名武大校友，不约而同地聚会在武大上海校友会追悼先师。陈毅市长得讯后，送来一幅“一代完人”的挽联，以示哀悼。在武汉，新生的武大校务委员会于11月15日在学校大礼堂为王星拱校长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全校师生和各界人士在这里遥祭这位可敬的校长。

追求民主 历尽坎坷

王星拱，字抚五（原名芳辰，字盛时）。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初九日，出生于安徽怀宁高河埠王家大屋的一个贫农家。祖籍山西。父亲王厚祺是个穷秀才，终生在乡里教私塾。王星拱同胞兄妹4人，他排行第三。3岁丧母，因家穷遂寄养于外祖父刘家。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深受外祖父一家人的钟爱。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安庆敬敷书院改为安徽省高等学堂。是年王星拱首批考入该校肄业。光绪三十四年

(1908)，安徽招考第一批官费英国留学生。王星拱与丁绪贤、张貽侗、洪遵等以优异成绩同时应试录取。王星拱被选送英国伦敦理工大学研习化学。该校较之牛津、剑桥等老牌大学更为开放、民主、活跃。在伦敦求学期间，王星拱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活动，庚戌年（1910）经吴敬恒（即吴稚晖）、石瑛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2年前后，曾与石瑛、丁绪贤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辛亥武昌首义后回国小住，不久仍返英国继续攻读。1916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适值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锐意改革，广揽人才，他被北大聘为化学教授，当时年仅28岁。他在北大任教期间，曾担任二院主任兼总务长。教学上，他除了主讲高等无机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化学、化学史等课程外，还为学生宣讲科学史、自然辩证法，积极而且通俗地宣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欧美新兴科学理论。著名的《科学概论》（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和《科学方法论》等著作，就是根据他当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的。政治上，他积极投身当时北大的民主与科学活动，曾与沈君默、陈独秀、钱玄同、程演生等共同提议组织大学俱乐部。经常为《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进步杂志撰稿。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同陈独秀、高一涵、邓初、程演生等一道，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分头到各娱乐场所散发陈独秀起草印制的《北京市民宣言》，揭露斥责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同年底，陈独秀遭北洋军阀的特务四处追捕的时候，他和李大钊、高一涵等计议，将陈独秀偷偷接至王星拱的家里隐蔽起来。事后，王星拱安排李大钊、陈独秀在他家里化好装，陈独秀穿着王星拱家厨师用的油渍背心扮成伙计，李大钊则扮成商人，乘着毛驴车掩护陈独秀脱险。1921年，安徽军阀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王星拱与旅京安徽人士张东野、杨亮功、苏雪林等为安庆“六·二”学潮赴京请愿团积极奔走，申张正义，揭露军阀镇压学生、歧视教育的罪行，力争教育经费。由于王星拱等人的

努力，安庆教育经费由每年80万元增加到153万元，并争得教育经费独立权。1923年，我国掀起过轰动一时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王星拱作为科学派的主将，积极参加这场论战。在各报刊上发表《科学与人生观》等一系列文章，极言“科学万能”。不久，他离开北京大学，赴南京任高等教育处长。时隔不久，便离开官场重回教育界，被中央大学聘为化学教授兼教务长。1926年离开中央大学回老家安庆，担任安徽省立一中校长。此时，曾暗中支持裴文英、郭士杰、陶锐等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同年底为营救中共地下党员郭士杰四处奔走。1928年安徽大学成立不久，规划需人。安徽省政府特延聘王星拱为安徽大学校长。他到任后，广揽人才，于安大原有文、法两学院外，成立了理学院。并计划增设农、工、医三个学院。同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决定筹设国立武汉大学。大学院长蔡元培指派王星拱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委会委员；8月又指派他为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与李四光、周鲠生、刘树杞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同年底，他离开安大来武大就职，直至1945年7月离开，任职长达17年之久。其间曾担任武大化学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农学院筹委会主任，并曾两度代理校长，1934年6月至1945年7月，正式担任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4月率全校师生，举校西迁四川乐山，在那里度过了极端困苦的8年。抗战胜利后，年近六旬高龄的王星拱，临危受命，在中山大学最困难的时期，出任中山学校长。这时期，国民党反动政权由于局势日非，企图挽回其江河日下的颓势，对国统区加紧独裁统治，对中山学校务也横加干涉。尤其对中大师生参加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更是肆意压制，血腥镇压。1947年，中大发生“五卅”惨案和“六一非逮捕”事件后，王星拱为迎救被捕师生，四处奔走，要求尽快释放全部被捕的师生。他的正当要求，遭到反动当局的无理拒绝，遂忿然离校赴香港。

并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公开讲话，表明他对国民党当局的态度。1948年3月，他愤然辞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携子女返回安庆。同年6月，国民党教育部批准他的辞职。适值其夫人叶玉芝在安庆病歿。在治丧期间，安徽省主席夏威借吊唁拜访之名，送来一笔仪程，胁迫王星拱去台湾。他断然予以谢绝。与此同时，南京教育部也陆续来电，并送来机票和路费，催促他飞赴台湾，他概未理睬。后来，他的胃病加剧，离开安庆，经芜湖前往上海就医。1949年10月8日，因抢救无效，溘然长逝。

披荆斩棘 创建武大

1928年冬，王星拱携家眷离开安徽大学，由安庆来到辛亥革命的发祥地——武昌，同李四光、周鲠生、刘树杞、曾昭安、任凯南等人共同着手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当时的武昌，由于军阀连年混战，百业凋敝，满目疮痍。政治上，由于蒋介石的公开叛变革命，封建专制横行，对共产党人血腥镇压，中国人民革命正处在低潮时期。刚上台的蒋介石，为达到其反动统治目的，一方面利用名流办几所象样的大学，为其装潢门面；另一方面对教育界加紧控制，企图培养一批为蒋政权效忠的人才。身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信徒、老同盟会会员的王星拱，为了民主与科学，便在这夹缝中着手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在这样的环境中办大学，他面对的困难和阻力是可想而知的。

首先，在办学规模和指导思想上，冲破封建势力和军阀残余分子因循守旧的思想束缚，大胆学习西方办学模式，兼容并蓄，开拓创新。例如在确定武大校址问题上，当时国内所有的大学都是建在城市中心地带，以便于控制。王星拱同李四光、周鲠生等人坚决反对将武大新校址设在原东厂口或市区其他地方，终于确定将新校址选在武昌远郊的东湖之滨落驾山一带。筹建国立武汉大学，是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第二中山大学）为基础的。谁都

清楚，武昌中山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尤其是后期，李汉俊曾将许多进步师生和共产党员隐蔽在这里。王星拱作为武大副校长，走马上任碰到的头桩大事，便是要按上面的训令对原武昌中山大学过来的学生实行甄别编级，清除“赤化分子”，实行“党化教育”。然而，作为学者的王星拱对此并不热心，只在布告栏上告示，谁是共党分子请予某日来自首登记。后来查明，当时既没有人去自首登记，也未听说有教师学生被逮捕。而且学校还为原中大学生代办毕业文凭。这些在当时全国其他大学里是鲜见的。

其次，在筹措办学经费上，当时国民政府虽然拨款150万元为武大建筑设备费。而武大建设实际所需费用大大超出此数。为了不影响学校整体建设，王星拱等人四处奔走，上下乞讨，左右求援，以补经费之不足。心诚所至，金石为开。结果平汉铁路管理局、湖南省政府以及湘、鄂、赣有识之士，慷慨解囊，所捐经费大大超过政府的拨款。有了充足的经费作保障，武大珞珈山校舍建设，从1929年3月勘测设计，到1932年2月全体师生搬进新校舍，仅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以这样短的时间，在一片乱石丛生、荒草遍地、交通不便的武昌远郊，建成一座规模庞大、气势雄伟的高等学府，在中外教育史上是不多的。

第三，向封建势力挑战，同封建遗老遗少作不屈的斗争。李四光、王星拱等人从有利于学校长期发展和师生教学研究的目的出发，经过斗争并经湖北省政府同意，终于选定落驾山（珞珈山）一带作为武大新校址。正当武大大兴土木之际，以武昌业主会陈云五为首的封建仕绅们，纠集一起，以武汉大学建校毁了他们的祖坟、破坏了风水为由，联名四处控告，企图阻止武大新校舍的建设。湖北省政府屈于封建势力的压力，出尔反尔，收回成命，硬要武大另寻校址。面对如此局面，王星拱等认为这不单是几个绅商的阻拦，而是代表了一股封建势力向新式教育的挑战。武大另

寻新址事小，此风断不可长。于是一方面派人到各官署说明武大建校迁址的实情，另一方面组织学生到社会上进行反封建迷信的广泛宣传，取得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这场风波才告平息，珞珈山校舍建设又继续动工。武大建校伊始，适逢显赫一时的前大总统黎元洪去逝。当时的湖北省军政当局，说是遵照大总统的遗嘱，三番五次要将黎元洪的灵柩葬在珞珈山，遭到王星拱的拒绝。湖北省主席兼武汉行轅主任何成谔的儿子投考武大三年未取，最后只许旁听不给学籍。这种清廉正直、不畏权贵的精神，为建立优良的武大校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立武汉大学创建的初期，王星拱除了担任筹委会委员、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理学院院长、化学系主任、农学院筹委会主任、仪器委员会主席、图书委员会委员、理科季刊委员会主席、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务以外，还两度代理校长，总揽校务。即便是王世杰担任校长时，主要校务仍是由王星拱负责。他不计较名誉地位，礼贤下士，事必躬亲。在蒋介石制造白色恐怖、推行“党化教育”的年代里，作为一校之长的王星拱，却“对于党务方面，所做的工作不多。对于政治方面，完全是外行”。他的目标和信念是“要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以满足我们共同求知的欲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

抗战军兴 刀丛办学

王星拱执长武大共计17年。这时期，正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蹂躏中华民族，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时期。面对工商凋敝、百业萧条、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局面，王星拱痛心疾首。这位毕生致力于民主与科学的老同盟会员，把一腔热血奉献给武汉大学的建设事业，把办好教育、培育人才作为“复仇”和“立国”的有效

途径。早在1931年10月，他就大声疾呼：“日本人民和我们1/4，国土不及我们1/10，常备军不敌我们1/20—30，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辱我们呢？虽是由于日本军阀之暴行，但是因为它的全国人民都有侵略中国的意志，而且又有可以侵略中国的力量。它之所以有这样统一的意志和充实的力量，是因为它的政治上了轨道，工业发展到了和近代列强同等的地步。不是已死的田中，或活着的本庄，可以临时造出来的。……倘若我们不能急起直追，在政治上没有切实合宜的设施，工业上没有系统的有效果的建设，我们将来永远不能自立起来。我们现在求学，就是对这些事业，作有效的准备。”否则，“我们永远没有打得过日本的日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尽管蒋介石一再推行“党化教育”，而王星拱则坚持无为而治，带领全校师生在日寇轰炸、物价上涨、特务横行的刀丛中艰难奋进。

为了保全武汉大学免遭日寇蹂躏，使莘莘学子在战乱中有个安全读书的地方。武大在武汉诸校中率先迁校。1937年冬，当南京沦陷、敌机轰炸武汉的时候，王星拱就着手迁校工作。一方面加紧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组织师生学习射击、战地救护、防空等识知；另一方面租借江兴、快利两轮将校中重要的图书仪器运往宜昌暂存，以避免无谓之牺牲。与此同时，组织精干得力的迁校委员会，派员先行寻觅校址，沿途分设办事处，负责照料货运、客运，尔后组织学生分批撤退。师生3月份陆续出发，4月29日便在四川乐山开始上课了。由于武大迁得早、迁得远、迁得稳、迁得快，使学校图书仪器及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在全国所有迁校的大学中，损失程度最小。这与中山、同济等校事先不作准备、突然仓促搬迁、几经辗转、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相比较，人们更加折服校长王星拱。这一切为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武大在乐山有了较安定的环境，图书仪器较充足，加上王星拱

无为而治的治校方法，至使各地借读生、转学生和报考大学的青年，纷纷涌向武大。使武大学生人数由入川时的600人猛增至1700多人。王星拱还利用武大有利条件，广延学者名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例如叶圣陶、朱光潜、桂质廷、冯沅君、李浩培、杨东莼、杨仁楩、彭迪先、徐中舒、李国平、唐长孺、高亨、王子香、张钟俊、余炽昌等知名教授，均在这个时期聘请来校执教。在日寇轰炸、物价暴涨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积极利用有限的条件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在一般课程中，灌注抗战的精神。既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使学生学到切实应用的技术。武大抗战时期培养的毕业生，许多人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作过很多贡献。

王星拱在抗战时期执长武大，日寇的狂轰滥炸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压垮这位教育家。倒是蒋介石推行的“党化教育”，使得这位信奉真三民主义的老同盟会员动辄得咎、创巨痛深。当时的乐山，也是乌云密布，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腐朽势力的斗争同样十分尖锐复杂。为了抵制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控制，他领导的武大，国民党区分部拖了两年才草草成立。成立区党部和三青团区分部时，学校不但没给一文钱资助，所借的50元开办费，王星拱亲自批示会计股要如数追收回来。而对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抗战问题研究会的活动，毫不加干涉，任其活动，甚至“抗研”上演话剧时，学校予以150多元的津贴。

在一般的大学里，训导长是挑选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无限忠诚的人来担任的，成为学校特务的核心。王星拱挑选的武大训导长，却是一位信奉真三民主义、辛亥革命的敢死队员赵师梅教授。赵师梅主持的训导处，不但不给国民党、三青团提供情报，反而以训导处的名义，连连上书驳斥特务分子的情报，为进步师生辩护，掩护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1940年，程天放统治的川大，三青团员有270多人，而武大的三青团员仅有44人。与此相反，当

时武大的共产党员有40余人，川大只有10余人。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会商请王星拱赴四川大学考察团务，而他迟迟未办，一拖再拖，直到9月底以疾病为由派刘笃生教授代理前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人士迫害加紧了。许多大学的进步教授遭受迫害，纷纷被解聘了。而王星拱领导的武大正相反，不但没有解聘一个进步教授，而且将别校解聘的杨东莼、杨仁榘、蒋思道、朱光潜、彭迪光、缪朗山等一批进步教授聘请来武大执教，并且聘请朱光潜为校务长，请缪朗山为学生开办俄语班。国民党教育部强令各大学实行导师制、军事管理，推行“新生活运动”，而王星拱一概未予执行。能拖则拖，不能拖则大事化小，不了了之，这是王星拱对付“党化教育”的绝招。各年级课表中虽列出了党义的课目，然而从未上过课，学校要求只在期末交一篇文章而算及格。1941年5月，国民党教育部为了加紧“党化教育”，突然下令要对应届毕业生实行总考，特别是第一要考党义。王星拱同情学生，决定将毕业考试与总考分开进行，前者先考，后者则一再延期。后来实在拖不下去时，学校向学生表示，总考不影响毕业，只要参加考试交卷，不管答得如何，都算及格。

王星拱在武大的一切开明措施，日益引起反动当局的不安和恼怒。国民党教育部几次想将他调走，另换CC派程天放来接管武大，都因武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得逞。反动派当即使用更加卑鄙的手段，利用不明真相的学生煽起“倒王运动”，对他进行人身侮辱和诬陷。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王星拱，面对军警当众掀翻他的黄包车、特务分子趁教育部长来校观察，用油漆在马路上刷写“打倒王星拱”的标语，以及300多个假签名的控告信，他毫不畏惧。相反，在乐山武大图书馆和学生宿舍里，明令禁止的《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照订不误；中共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组织的各种讨论会、郊游、举办壁报、开办民主墙等活动，学校不加干涉。从1941年元月到1945年7月他离开武大前夕，以

校长个人名义发出的公开保释被捕学生、驳斥国民党特务的情报、为进步师生辩护开脱的公文，多达十余件。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校内有多少秘密共产党员。但他的民主进步思想，正直的爱国行为，为我党培养大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and 间接的促进作用。

教育主张 高瞻远瞩

王星拱长期从事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对教育工作提出许多有见地的主张，其主要之点是：

第一，办教育要有深远的目光，学校教育要适应健全社会的需要。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直接了当主义。有这种思想的人主张，学校仅仅开设那些出了校门就有饭吃的科目就行了。这种观点虽然也谈到了教育要适应社会的需要，但这是一种简单的消极的适应。王星拱指出，社会是发展变化着的，我们不能无条件地讲适应。因为病态社会所需要的东西和健全社会所需要的东西不同。适应病态社会的条件和适应健全社会的条件也不同。我们要适应世界上进步的大环境，不要适应国内落后的小环境。要适应人家已经走到20世纪的环境，不要适应我们还留在十七八世纪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仅仅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起着创造环境，改善环境的作用。他还指出：“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仍然不往近代化的途径上去努力，使我们的后人还是感受同样的困难（指贫穷落后，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那就是我们所造作的不可饶恕的罪过。……在任何困难状况之下，我们要近代化我们的国家，在任何困难状况之下，我们要获得专门学识。因为所有近代化的事业，都是需要专门的学识才能创设起来的。”他还指出：“一种学术之影响于民族的兴衰及国家之隆替，往往都是在数十年之后。所以办教育要有深远的目光。”

第二，学校要养成“研究实学”的风纪，大学要以“探求高深的理论”为己任。所谓研究实学，实际上是指教学和科研中，摆正理论与应用的关系。他说：“理论之最后目的还是应用。然而倘若我们天天只把直接应用的目标摆在眼前，反而不能得着圆满的应用的结果”。他举解决吃饭问题为例，野蛮人是通过狩猎的办法，而文明人则要种田，要研究地质学、土壤学、化学、气象学、数学和物理学，以至于法律、经济学等。根据这个道理，大学应该以探求高深理论为己任，明确这一点，应用方面的技能训练才可能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他认为“有人主张大学只研究理论的知识，具体的办法就是只设文理两科，至于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才的造就，应当让专门学校去负这个责任”的主张是片面的，是不合中国国情的。他说：“这样的制度在欧美各国也有实行的，并成效甚佳。但是，在中国恐怕不能获得同样的结果。如果在大学里不能养成专门的技能，在经费较少、规模较小的专门学校里边，更不能养成专门技能。所以这个责任还是大学所应当担负的”。但是，他又指出，在理论与应用之间，大学应当把重点放在理论研究上。要避免把大学办成普通职业学校或专校的倾向。

第三，学校要注重基础课的教学，教授传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探求知识的方法。他说，武大的课程有一定的标准，于切近的应用和基础的理论自然都应当顾到。学校课程的重点应当是基础课。这一指导思想对高年级和低年级都是适用的。这样安排课程，对高年级来说，主要是帮助他们做好毕业后服务社会的准备。他指出，中国本来是贫弱的国家，工业未能发展，因与工业有关的各种社会事业也未能发展。……应用的知识，在平常状况之中，是可以无问题的，倘若遇了不同的环境，或者有一个困难发生，必须有理论的源泉，方才可以应付或解决。……所以我们对于切近的眼前的应用知识固然是应当注重，但是对于广阔的

稳固的理论之基础，仍然是不能轻忽的。对于当时毕业生学非所用的情况，他认为“在社会不安定的状况之中，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因急于谋生活，往往要抛弃原来所学的东西。根据这些情况，学校添置一些殊特的科目，为学生毕业后便于研究特别的问题，这也是必要的。但是也仅为了打好理论基础，以不变应万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求切实的学问，有学问而社会不能用，是社会负我；没有学问而求用于社会，那是我负社会。宁使社会负我，不使我负社会”。

第四，在道德上，学校要为国民树立表率，他说：“各国大学制度不同，有的侧重于知识的创造和联续，有的还要并重人格的培养。我们的学校是采取第二个原则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大学的任务有三点：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因此，他要求师生要有英发的精神，整齐的步伐，奋发的情绪，坚定的意志。为此要在学校中进行人格教育。他说，大学师生倘若精神萎靡，事业做不成，学问也求不得。他特别强调的是战争和困难时期的人格教育。他说：我们素来负着介绍近代科学的人们，在平常时期，要注重物质的创造和补充。但是，在非常时期，要注重精神的锻炼和警惕。这是我们师生们的义务，是我们的责任。

王星拱不仅这样说，他的实际行为，也为师生作出了表率。在当时腐朽的社会里，作为堂堂国立大学的校长，他冷落权贵、疾恶如仇，献身教育，一生清贫，博学多才，情操高尚。青年时期，风度翩翩的留洋教授竟与一位目不识丁的村姑结发为妻，而且一直到白头偕老。这在旧社会是不多见的。他对子女要求甚严。学校为校长购置的小汽车，他从不让子女乘坐。有一次司机顺便将他的女儿捎带进城，他发现后大为恼怒，硬是向学校补交了车费。在他任期内，子女没有一个出洋留学的。在学校里不许他的子女申请贷金，把贷金名额让给更贫困的学生。不仅如

此，还常把家中积蓄救济贫困的教师和学生。在旧社会，出国研究是人皆羡慕的事。1937年由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指名王星拱前往英国研究，而他将这美差让给了黄叔寅教授。他和陈独秀是挚友，不仅在“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一起掩护陈独秀脱险，而且在陈独秀被诬为汉奸的时候，他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公开登报为陈独秀辩证。当陈独秀被国民党软禁在四川江津的时候，他不顾特务们的威胁，经常去看望陈独秀。在陈独秀身患重病、经济无着的窘境中，他慷慨解囊，捐款2000元为其购药治病。陈独秀病逝后，王星拱为恐挚友的书稿散失，多次去信江津，叮嘱何之瑜妥为保管。抗战刚胜利，王星拱在自己任职无着落、心情沮丧、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他掏钱置办酒席，请来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及陈独秀的亲人和友好，商定陈独秀的遗著出版问题。

(1988年9月写于武汉大学)